

中国现代史丛书

薛庆超 著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丛书

薛庆超 著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薛庆超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1 (2014. 4 重印)
(中国现代史丛书)

ISBN 978-7-220-08501-7

I. ①长…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4. 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70873 号

ZHONGGUO XIANDAI SHI CONGSHU

中国现代史丛书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薛庆超 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刘周远 李洪烈
王定宇
邹小工 王泉语
戴雨虹
徐 英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165mm×235mm
16
31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2 版
2014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220-08501-7
2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	001
第二章	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	007
第三章	中共中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015
第四章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转变	019
第五章	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029
第六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035
第七章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042
第八章	和谐气氛中的遵义实录	050
第九章	张闻天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	056
第十章	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决议》	065
第十一章	遵义战役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	070
第十二章	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	079
第十三章	中共领袖、红军指战员与“茅台酒”	085
第十四章	毛泽东精心部署巧渡金沙江	091
第十五章	林彪上书中央 会理会议批评林彪	099
第十六章	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	107
第十七章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泸定会议	114
第十八章	最早到达陕甘的南方红军部队	120
第十九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25
第二十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北上方针	132
第二十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向陕甘进军	141
第二十二章	中共中央脱离危险区域	150
第二十三章	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	159
第二十四章	《大公报》消息“定乾坤”	166



第二十五章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	175
第二十六章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肃反”，释放刘志丹	182
第二十七章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并肩作战	189
第二十八章	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7
第二十九章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与张国焘的斗争	206
第三十章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艰苦卓绝的情报工作	214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中央确定新的政治路线	225
第三十二章	西安事变结束“十年内战”	233
第三十三章	长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237
后 记		249

10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一第
107	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二第
21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三第
01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四第
03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五第
03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六第
01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七第
02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八第
02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九第
02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第
07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一第
07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二第
28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三第
10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四第
000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五第
10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六第
11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七第
03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八第
12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十九第
13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二十第
14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二十一第
12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二十二第
129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二十三第
10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	章二十四第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全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怒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结重兵，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动“围剿”，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9月，由于王明将要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秦邦宪（博古）。1933年1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召开了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为目的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左”倾教条主义达到顶峰。

从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100万兵力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自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尔后夺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死打硬拼，采用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同国民党军决战。虽然红军给予国民党军重大打击，但红军主力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左”倾领导者又分兵六路全线防



御，使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这时，因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妥协、对内内战，导致国民党政府的营垒中出现分裂。曾经在上海抗战中拒绝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强令开赴福建“剿共”，企图借刀杀人，使中国工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互相残杀，借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第十九路军识破了蒋介石的计谋，开赴福建后立即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取得联系。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包括在江浙一带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向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关于第十九路军的阶级性质，毛泽东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主动放弃了这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可以团结互助的同盟军。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屡次遭到失利。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一带进军，以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由此拉开长征序幕。

193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此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派出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国民党军以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进攻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边出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3个师，共6000余人，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曾洪易（后叛变）为中共中央随军代表。1934年7月6日晚，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尤溪、谷口、水口，直逼福州近郊。福建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迅即调集重兵进行追击和堵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边战边走，向闽东转移，相继攻克罗源县城、穆阳镇和庆元县城。9月初，进入闽北革命根据地东北古楼一带游击区。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西挺进，先后攻占清湖、常山等城；继而转向皖赣边行动，于10月下旬进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地方部队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这时，中共中央已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十军团改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指挥。11月中旬，第十九师向浙皖赣边进发。11月18日，中央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日趋严重，决定红十军团率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外线作战，会同第十九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地区活动，创建浙皖边根据地。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

11月下旬，红十军团主力向浙皖边前进，12月10日在皖南汤口地区同第十九师会合。这时，国民党军两个多旅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汤口进逼。14日，红十军团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战斗失利，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负伤后牺牲。随后，国民党军1个师又两个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共约20个团的兵力蜂拥追来。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红十军团为摆脱国民党军，艰苦转战于皖南地区，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损失严重。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转移。进至德兴县港头村时，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袭击，红十军团部队被截成两段，红十军团主力约2000人被围于怀玉山地区。经七昼夜顽强战斗，红十军团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先头部队1000余人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经过整编，组成500余人的红军挺进师。此后，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遭失败，但扩大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推动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配合了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夏天，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利。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到湖南省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由红二军团改编的红三军取得联系，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据此，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成立了



以任弼时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的西征行动。8月7日，红六军团率领第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破国民党军设在衙前至五斗江、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寒口至广东桥的多道封锁线，于11日挺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至此，红六军团胜利突破重围，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12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当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地区出发，经汝城、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23日到达零陵东北蔡家埠地区，准备西渡湘江。这时，国民党军1个旅及保安部队已先红军1天到达湘江，沿江展开布防，而国民党军追击部队1个师已进到阳明山地区，另1个师和2个民团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开进。在国民党军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向东转移，于25日挺进到阳明山区。此时国民党军已分别从南、北、西三面逼近阳明山。

红六军团为甩开国民党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于8月26日进到白果市。随后又急转南下，28日到达嘉禾附近，接着急转西进，连续急行军3天，于8月31日乘虚在道县以南的薛家厂渡过潇水，甩掉了追击之敌。继而，经清水关进入广西北部。9月3日，红六军团在灌阳县文村击溃国民党湘军一部和桂军2个团。次日，于兴安县界首以北凤凰嘴地区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城。11日，进至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接着，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准备在绥宁以东地区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国民党湘军，未能得手。红六军团随即向南，袭占通道城。18日在靖县新厂歼灭湘军2个团大部。10月1日，袭占贵州省的旧州。国民党军为阻止红六军团同红三军会合，以入黔的湘军、桂军主力进至石阡及镇远县拦截，以桂军、湘军、黔军各一部由南向北压迫，企图将红六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西南甘溪同桂军第十九师遭遇，一部被截断（后与红三军会合），红六军团主力转入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的高山密林，同国民党军20多个团周旋。与此同时，红三军主力由黔东革命根据地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10月23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贵州省印江县木黄。24日，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红六军团经过近80天艰苦转战，行程2500余公里，打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并为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9月至1934年夏天，红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致使红一方面军屡战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4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

决战后，损失严重，形势危殆。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准备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共产国际研究后，予以同意。中共中央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目的是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一方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革命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在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详细记录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装备情况：

“野战军”是红一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使用的番号，分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一纵队、军委第二纵队，共86859人。

其中5个作战军团共72313人，有步枪、马枪25317支，短枪2804支，重机枪333挺，轻机枪285挺，自动枪28支，共29016支（挺），平均每百人拥有枪支数仅40余支。

整个红一方面军共有33244支枪，共有子弹1858156发，平均每支枪只有不到56发子弹。

整个红一方面军拥有迫击炮38门。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还有梭镖6101支、马刀882把。由此可以看出，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是手持大刀、长矛进行长征的。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共携带冬衣83100件，平均每人不足1件冬衣。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携带盐34826斤、钱164.2万元、药714担。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共有马338匹。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5个军团中，兵力最多的是红一军团，有19880人；兵力最少的是新组建不久的红八军团，有10922人。

这就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的全部兵力。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按照预定计划，红一方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地区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为了掩护中共中央和红军突围长征，江西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红军在于都集结的消息，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机关也加强对干部和红军战士的保密教育，并制造各种假象迷惑敌人。为了确保红军安全、迅速渡过于都河，红军工兵在于都人民的



协助下，每天傍晚前开始在于都河架设5座临时浮桥，20时以前完成，然后红军主力和中央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分批通宵达旦通过浮桥到达彼岸、开始转移。第二天7时以前，红军工兵又将浮桥拆除，隐蔽在于都河岸边或浅水中，不留任何痕迹，使敌人难以察觉。傍晚前再次重新架设浮桥，让第二批长征部队通过。如此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直至10月20日长征部队全部过了于都河。由于保密工作严密、措施得当，使得国民党军谍报部门和派出的侦探毫无察觉。这是红军指战员、干部和于都人民共同创造的保密工作的奇迹。

10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红一方面军继续西进，至11月15日，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第二章

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连续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判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转移的战略意图，遂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分五路“追剿”。同时，命令桂军5个师、粤军4个师及黔军一部进行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企图将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分四路纵队，从全州、兴安间西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当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击破桂军的阻击进入桂北。27日，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但后续部队因辎重过多，道路狭窄，行动迟缓，未能赶到渡口。此时，国民党“追剿”军已至全州、零陵、道县、东安地区，桂军5个师开至灌阳、兴安一线。为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桂北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红五军团在永安东、水车一带与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12月1日保护中共中央机关渡过湘江。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虽经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师长陈树湘和绝大多数指战员英勇牺牲。

此时，红一方面军已折损过半，兵力锐减为3万余人。

长征初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政治委员的红军老战士罗元发回忆说：

1934年9月，开始长征前，我们中央苏区红军各军团整整打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仗。原来红军根据地以江西、福建为中心，包括闽粤赣地区形成29个县的广大地区。如今却只剩下瑞金、长汀等几个县了，其余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游击区和敌占区。我们五师十五团从前线撤下来后，按上级指示向瑞金附近地区集结。到了那里我抓紧时间补充新兵，同时还补充了一些服装。不久便知道，红军要突围离开中央苏区了。因为行动仓促，部队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也可能是怕敌人发现我军



的动向，所以我们只好不声不响地秘密离开了苏区。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我们出发前，告别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们时，我看到许多父母送儿、妻子送丈夫的情景。走在他们的前面，看到他们眼里流出来的泪水，心中十分痛苦。乡亲们拉着红军干部、战士们的手说：“盼你们早日回来。”同志们回答说：“老乡们，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看得出，当时军民的战斗热情很高，情谊很深。

在瑞金一带集结的部队除我们三军团外，还有第一、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此外，还有中央直属队共8万多人。10月10日，开始突围时，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前面开路，一军团为左路前卫，我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第八、第九军团在两侧，五军团为后卫兵团，掩护中央机关。敌人走大路，我们走田间小路。整个部队一天只能前进几十里。我们部队为了掩护大部队的行动，常常要急行军，有时一夜要走百多里地。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打了几个小仗，伤亡也不大，但部队十分疲劳，病号不断增多。像脚上打泡、磨破脚都是很平常的事。部队谁也不知道往哪去，总是一直向前走。这样，使许多战士产生了不少思想问题，新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有的战士就说怪话：“打不像打，走又走不动。我们这样如同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是为了什么？到哪里去？同志们并不清楚。这时掉队人员也日益增多起来，部队里的兵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巩固部队战斗力已成了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身为团政委，我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我军继续向湘西方向前进。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纵队从新安、全州之间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长征开始以来一次最紧张最激烈的湘江战役。我们五师奉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以每天100余里的速度急行军日夜兼程，抢占湘江渡口。军团配属炮兵营给我师。李天佑师长命令十四团和我十五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任务。我团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迅速赶到新圩附近，利用有利地形，控制最高点构筑工事，阻击广西白崇禧部队的进攻，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湘江。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

我和团长白志文、参谋长何德全，仔细研究了上级交代的任务后，便迅速带领部队到达制高点，构筑工事，组织防卫。我们面前，是一条通往灌阳的道路，这是敌人逼近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是一片丘陵地带，草木丛生，有利于部队隐蔽。十四团在我左翼，我团一、三营在前面，二营约距500米左右作为预备队。我们部署好部队，立即派出侦察员，不久即接到报告：敌广西第七军两个师，正向我军迫近，距我军大约20华里。我们只有两个团兵力，面对敌人两个师，阵地又是在平地上，只有些小丘陵地带为依托，三四天的任务确实很艰巨，但经过政治动员之后部队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大家表示了保证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

决心。这时师首长告诉我们，军委炮兵营武亭同志带领的红军炮兵营和你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他会用火力支援你们。这增强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正在这时，我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沿着大路正向新圩疾进，他们却没想到，我们这只铁拳早等候多时了。

双方一经接触，战斗就十分激烈。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满天，很快扩展到看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红军炮兵营的大炮，向敌发起猛烈轰击。炮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这时，敌人屁股正对着我们，我军抓住机会，步枪机枪一齐向敌人射去。第一天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傍晚，敌人又增加了兵力。第二天拂晓，敌人集中兵力发起进攻，战斗更加激烈。我们观察敌人的大部队约有两个团的兵力向我阵地攻来，并以一部兵力向我侧翼迂回包围。经过多次反复冲杀，由于敌人炮火配合步兵进攻更加猛烈，我一、三营伤亡增加，前沿几个小山包丢失。地形条件很不利于固守，但战士们一直坚守着阵地。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一个个重伤员从我团指挥所旁抬过去。战斗到中午，敌人又集中兵力，向我阵地发起攻击，妄想夺取整个阵地。这时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住阵地，才能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的任务。”这时候，三个营长已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达到200余人。师领导知道后派人到我团慰问。并告诉我们接到军团通报：中央纵队正在渡河，兄弟部队已经大部分过去了。

我知道师首长对我们这里很担心，我也明白，我们的任务艰巨，部队伤亡再大，阵地也要坚守住。如果敌人攻占了阵地，新圩渡口被敌人控制，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我向师长表示了我们的战斗决心，同时也表达了我们一直想到的一点意见：我们坚守主阵地，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的连续进攻。同时也希望中央纵队能快速过河。中央纵队抬着许多笨重的机器、坛坛罐罐，如果能轻装，行动起来就快得多。中央纵队早过河去，我们就放心了，也使部队减少伤亡和损失。师首长答应转达我们的意见，我心中也感到轻松多了。

战斗打得很激烈，不久，我和团长都负了伤。团长伤很重，已不能动弹。我头部负伤，疼痛难忍，但还能坚持行动。想到如果团部里两位主要领导干部都下去，势必影响部队战斗情绪，我坚持留下继续指挥战斗。参谋长何德全向师部报告了这个情况后，师长、政委十分着急，当天下午便派师参谋长胡震来代理团长指挥部队继续战斗。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我把二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侦察参



谋熊奎、青年干事钟元辉，表现得很勇敢。就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约700人。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战士们仍坚守着阵地。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坚持到12月1日下午4时，师部传达军团部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兄弟部队。我们把伤员安排好，才迅速过江，追赶主力部队。

我团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多次战役，每次战斗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们师参谋长、几位营长和许多革命战士都血洒湘江，这使我永远难忘“左”倾路线给我们的部队留下的沉痛教训。

在红五军团主力渡过湘江以后，负责后卫的红军继续在江口边阻击敌人，战斗仍十分激烈。最后，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被敌切断，未能过江，造成严重损失。

在湘江战役中，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经历了异常惨烈的生死搏杀。

1934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政治部分别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和政治训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分4个纵队前进。红三军团和军委一部、红五军团一部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郑家园向灌阳前进，直扑湘江。

这时，国民党军湖南军阀何键的“追剿军”第一路两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疾进，第二路一部已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第四、五路由宁远向东安白牙市集结。形势十分紧张。红一方面军要与敌人在湘江一线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系于此役的殊死战。

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下达了坚守阵地不许撤退，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渡江的命令。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接到命令后，于11月28日抵达湘江岸边，在界首、兴安之间选好渡河点，迅速组织部队渡过湘江。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虽然进至界首，但师的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赶到湘江渡河点。而此时敌人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脚山铺的红二师发起了进攻，一部正全力向黄沙河开进。其他几路也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的红军后卫阵地进攻。桂军主力已分两路北进，企图夺回据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正抢修工事时，桂敌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四十五师已向他们扑来。大批敌人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敌人占据着脚山铺西北一带的高地，而且有事先构筑的坚固工事扼守。红十团等部的红军阵地，全部处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上级要求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牢牢地钉在光华铺的阵地上。红十团以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悬殊，战斗非常残酷。

当敌人冲到红十团有效射程之内时，红军战士奋起还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大批敌人纷纷倒地。但是，敌人以集团冲锋突入红十团的前沿阵地。团

长、政委命令，将手榴弹集中起来，集中投向冲上来的敌人。顿时，红军指战员雨点般的手榴弹投向敌人，挫败了猖狂敌人的锐气。第一波攻势被红军打了下去。

调整后的敌人再一次冲上来，这一次的攻势更为猛烈。红十团团长中弹壮烈牺牲。红四师参谋长立即被任命接替红十团团长的职务，下午，新任团长又牺牲了。同时，许许多多的战士也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当敌人蜂拥而上时，红十团指战员多次一跃而起，从战壕里冲出，和敌人进行白刃战。被鲜血染红的阵地，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

12月1日1时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一定要阻击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保证西进道路在红军手中。3时半，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政治部向红军部队指出，12月1日的战斗，是关键的一仗，“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一定要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通道，保证红军全部突过湘江封锁线。红军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红十团面临武器精良、数倍于己的强敌，无所畏惧，奋勇拼杀。最后，红十团付出了巨大牺牲，一直坚持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才奉命撤出阵地，随部队继续西进。

长征中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工作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忆说：

长征初期，我们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亲自组织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当红军到达（湘南）宜章时，白区地下党动员群众欢迎我们。1928年朱德与陈毅在这里领导了湘南暴动，我党的影响很大，有很多红军干部是由这个地区成长起来的。我们在宜章休息了两三天，蒋介石尚未搞清我军战略企图，当时敌军主力也未集中。据说毛泽东曾建议不要西进，就地选择敌人弱点歼灭追击之敌。后来听说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也提出放弃西进计划，以三军团向湘阴、宁乡、益阳挺进，军委率主力集中溆浦、长沙、沅陵一带开辟战场，创建根据地，尔后择机歼灭敌较弱的湖南一路。但这些建议都未被当时的中央接受。不久，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将沿红六军团长征路线渡湘江经全州、兴安间西进，与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漓水与湘水之间布置了一个“口袋”，派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总指挥，指挥五路敌军部队，包括由中央苏区尾追红军的蒋介石嫡系两个纵队与广东部队、湖南部队以及贵州王家烈部，还有桂系部队，在全州、兴安一线堵截我军。我们以七八万兵力钻入敌军数十万之众预设的伏击圈中，这是在战略上最大的失策。幸好各路敌军之间有矛盾，可被我们充分利用，如桂系害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广西腹地，使蒋介石得以派兵进入广西，吞并广西，所以当我军西进时，李宗仁、白崇禧下令将兴安、全州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加强桂林防御，这样使湘江防线西段暴露了一个口子。

1934年11月25日，我们奉命向湘江防线界首段疾进。红十团是前卫团，我们



三营是前卫营。部队奋勇前进，于27日前到达湘江界首，驱逐了民团，掩护工兵于当日16时左右架设好浮桥。团长沈述清率领我们三营一起渡江，我们选择了光华铺防线，以大路旁一个庙宇做依托，向兴安方向警戒，并连夜构筑了工事。我营以七连、九连为第一梯队，各配属重机枪两挺；以八连为第二梯队，这是我团的模范连，能攻善守。部署完毕，沈团长检查后，即返回团部。在我营掩护下，红四师师直属队与十一团、十二团渡过湘江向老山界龙胜方向疾进。下半夜在我营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大部分沿湘江边运动，我当即加强了前沿警戒部队并进入战斗，将情况报告团长。团长分析，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遂令一营进至湘江边防御。果然敌人利用我防御接合部渗入，在夜色中双方接火，展开混战。从俘虏口中查明，这股敌军是桂系第七军独立团和十五军四十五师的部队，每人带有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交战中，派八连出击，因视度不良未奏效。双方在原地对峙，战斗小组规模的反复冲杀不断。28日凌晨，团长沈述清在率领一营作战中光荣牺牲了。他是理发工出身，工作特别细致，待人和蔼，作战勇敢。此时，杨勇政委赶来了，他打起仗来奋勇当先，几次危急时都是他带领全团一起反冲击，巩固了阵地。杨政委立即调整了一营、三营的防御部署，敌我双方在都没有工事的情况下反复冲杀，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我军才终于把阵地稳定下来，并始终把浮桥控制在我军手中，直至掩护后续部队包括军委纵队顺利渡江。战斗中，我营七连长谢兴福（江西人，历任司号员、排长），28日上午右手负伤，包扎后不下火线继续战斗，中午时分光荣牺牲。由于我营伤亡过大，被团调整为预备队。沈述清团长牺牲后，上级派师参谋长杜中美来代理团长，路经我营时，我将情况作了简要报告，不幸他刚到团指挥所不久又牺牲了。28日晚，红五师赶到，由参谋长胡浚率十三团前来接防，正当胡浚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不幸中弹身亡。胡浚既是我的上级，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战友，他是湖南益阳人，益阳篮子是出名的，他在家当过篾工。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他是何键部的一名班长，解放过来后参加了红军。1931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我们同时负伤，一起住院。当时他当排长，我当连政委。那时注重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送他进了红大学习。毕业后先回五军一师当师长，师改为团后又当团长。这期间我们都在一起工作。后来他又由红十团调到五师当参谋长。我的许多领导、战友都是无名英雄，他们以鲜血和生命掩护红军主力，特别是配合红一军团保障了中央军委机关与兄弟军团安全渡过湘江。这次战役仅我们红十团就付出了伤亡400人的代价。在当时情况下，烈士的遗体只能就地掩埋，年深日久也查不清楚了。但他们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红五师接防后不久，桂系主力增援部队赶到。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红五师付出了重大代价，光荣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我们红十团离开光华铺后向西急行军，越过了老山界。李宗仁、白崇禧对我军一是派部队尾追，一是派民团骚